

日本侵略者对海南岛的文化渗透



三亚红沙日语学校师生(资料图片)

海南海军物务部总监池田清(资料图片)

◀上接B07版

其二是新建小学,即日军占领后新设的日语小学。为了强化日语教育,日军规定所有的既有学校必须增配一名日本人教师担任副校长,负责日语教学工作;新建的日语学校则必须配备日本人校长。按照日军要求,当时的小学主要开设日语、修身、数理、体育、艺术、劳动等必修课程,其中日语课的学时数最多,为每周6学时。为了规范日语教育,三省联络会议还专门制定了《发行教科书的相关规定》(1942年7月16日),提出了一个争取在六年内编纂发行全12册《日本语读本》以及与之配套的全套挂图的计划。

在中学教育方面,三省联络会议也规定所有中学都必须配备日本人教师,必须增设日语课为正式的教学科目,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学习日语。

为了解决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日本占领军还在岛内开设了两所职业学校,分别是加积农学校和那大农学校。加积农学校成立于1943年10月11日,那大农学校成立于1944年9月25日。前者在籍学生数为100人,后者为50人。据曾在加积农学校就读的老人回忆,该校的所有教师都是日本人(包括来自台湾和朝鲜的教师),所有课程均用日语授课。

2.成人教育

第一,师资教育

由于在短时间内兴建了众多的学校,使得岛内原本十分匮乏的教师资源更加捉襟见肘。笔者曾采访过当时在中小学校就读或工作的14位老人,据他们回忆当时在中小学校担任日语教师的大多是日军中的文化程度较高者,而非科班出身的教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42年4月日军在海口市创办了海南师范学校。该校主要招收来自日本国内或台湾、朝鲜等殖民地区的学生,进行六个月的培训后分配到岛内各地做教师。除此之外,该校还承担了中国人教师的再教育任务。从中国人教师的教育内容看,日语课所占时间最多,为每周12节。培训的主要目的是让中国人教师能够“顺应东亚之新形势”,成为“能够自觉意识到新海南岛之使命的指导者”,换言之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为

对海南实施文化渗透的指导者,从文化上进行殖民。

第二,公务员教育

日军在海南岛采取的是“支那人自治”,即“以华治华”的统治政策。三省联络会议于1942年7月16日专门出台“海南岛人公务员训练纲要”,要求对琼崖临时政府、市县政府及地方治安维持会的骨干进行培训,目的在于使受训者“认清当前时局,培养其积极配合我方之精神”。为此,日军专门在海口设立了“公务员训练所”,所长由海南海军特务部政务局长亲自担任,“主事”、“教官”、“助教”等也都由特务部官员担任或兼任。训练内容包括“实施大东亚民族共荣的思想观念教育,以及公务员所需知识及实际技能的训练”,其中日语课被排在了首要位置。

第三,警察教育

1941年11月8日,三省联络会议出台《海南籍警察训练纲要》,决定成立“警察训练所”,培养“为我方所用的海南籍优秀警察人员”。纲要指出,“警察训练所应进行以皇道为基础的东亚民族共荣的思想观念教育,传授警察所必需的知识,实施实际技能训练”。训练所的所长亦由特务部政务局长担任;顾问由陆军警备司令官或由其指定的军官担任;其他职位也都由特务部官员或日军军官担任。训练所内设本科及特别训练科。本科负责培训一般警察,特别训练科负责培训高等、思想、刑事、情报等部门的专属警察。本科开设的教学科目有日语、刑法、违警罚法、警察行政、一般卫生、犯罪搜查、情报收集、户口调查、保甲制度、工作职务、礼仪、检查、军事训练等;特别训练科的教学科目则须经教务会议审议后,由警察训练所所长亲自制定。

第四,黎族教育

黎族是海南岛的世居民族,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居住地区却涵盖海南岛的广大中部山区。日军侵占海南岛后制定了实施民族离间政策,将黎区建设成为对抗我抗日游击队的缓冲地带的统治政策。1942年7月16日,三省联络会议专门出台了《黎人训练纲要》,提出要在海南海军特务部的指导下对“将来在我方黎族

地区从事警察工作,以及执行推动其他各项政策之人才”进行培训。受训者的选拔标准为年龄在十四岁以上二十岁以下,出身于黎族的名门望族,将来有望成为部族的中心人物,且身体强健者。培训内容包括培养受训者“绝对依附于我方的思想意识、普及卫生观念、培训黎峒自卫所需要的技能等”。培训科目包括训育、日语、卫生、礼仪、点检、教练、自卫警察、农业实习等。其中对黎族青年的思想教育(训育)和日语教育被排在了前两位,其对黎族青年实施文化渗透的企图不言自明。

管控大众传媒

日军登陆之后即组建报社“教导岛民”,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日军对海南岛实施文化渗透的另一重要手段是通过对大众传媒的管制和利用,影响海南民众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政治观念,以把海南民众变成天皇制下的顺民和开发掠夺海南岛资源的重要力量。

日军一向重视对殖民地人民的“宣抚工作”。在日本侵略海南之前,台湾总督府制定的《海南岛处理方针》中便已制定了加强“绥靖与宣抚”,“纠正岛内排日思想”,在岛内“配布《香港日报》《全闽新日报》等报纸,同时利用海口的《琼崖民国日报》及《琼崖新民日报》之设施,刊行新闻,向岛内及南洋各地配布”的具体政策。

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南岛内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以海南书局为代表的传媒机构积极宣传抗日思想,出版了大量的抗日书籍。日军侵略海南岛可谓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也遇到了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岛内抗日力量的激烈抵抗。为了减轻国际舆论的压力,缓解海南民众的抵抗情绪,日军专门组建了“报道部”。报道部主要负责“宣抚”工作,目的是使海南民众“理解”占领政策,安定岛民人心,制造军民和谐的假象。据报道部成员,随登岛军舰同期抵达海南岛的日本著名军旅作家火野苇平记录,报道部在驶往海

南岛的军舰上便开始了工作,每天编写“阵中新闻”,鼓舞士兵士气,以便对海南岛进行长久的占领。

1939年2月12日在占领海口的第三天,日军便开始了宣抚工作。火野苇平在《海南岛记》中记载:军乐队正在海口街道上行进,报道部的卡车疾驰而来,我们坐在车上,到处散发传单,并在市内各地张贴标语。我们还雇用人力车,车上堆积着传单,向博爱路出发”,“电线杆上、墙壁上、街道角落等处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告示和传单”。告示和传单的内容主要是为日军侵占海南岛寻找借口,宣传占领政策,其中一则布告如下:

“日华事变发生以来半年,于兹忠勇果敢的帝国陆海空军将兵,无不百战百胜,去年攻略广州及武汉三镇,已完全掌握全中国之要城。

我作战军队此次在海南岛大举登陆,而陆海空军紧密联系之下,完全控制全岛,于日本海军完全占有势力之西太平洋上,现在孤立命运之海南岛,应倚赖日本之外无别途。

我军按照帝国政府屡次声明,不敢敌视中国民众,所以无辜岛民宜安心就业。纵然属于正规军或保安队,若能悔悟其非,抛弃枪支,随我做协力者,一律应当保证其生命财产。倘若有向我军抵抗加害者,或与敌军通款者,无论何人,决不宽恕。

日本军队对岛民所要求者,就在使岛民从速觉悟过去错误,抛弃抗日容共之偏见,信赖正义之日军,而建设反共亲日之乐土。特此布告。”

由布告内容可知,日军通过发布传单等手段安抚岛民,企图使岛民放弃抵抗,做日军治下的顺民。

为了宣传日军的统治政策,日军加强了对新闻媒体的管制。由于地理上孤悬海外,政治上远离政治中心,日军侵占之前的海南大众传媒业并不发达。当时海南岛内最为著名的传媒机构,应为王梦云、唐品三等人创办的海南书局。该书局虽因日军侵略海南而被迫关门,持续时间较短,然而由其整理出版的《海南丛书》、《琼州府

志》等书籍,至今仍是研究海南历史的重要文献。同时期的海口,仅有《琼崖民国日报》和《琼崖新民日报》两种报纸,合计日发行量仅为1300份。此外,在文昌、乐会等地还有《文昌周报》《乐会半月刊》等小型发行物。

2月10日,日军在占据海口的当天,便由报道部强征海南书局的房屋和设备,着手组建新的报社。2月13日《海南迅报》社正式成立,15日发行第一张报纸。从火野苇平《海南岛记》的插图看,《海南迅报》的发刊号刊有《发刊之辞》、《日本海军登陆于南方地区》的报道,以及《海口市治安维持会准备委员会布告》等内容。由于字迹模糊不清,《发刊之辞》的具体内容无法详知,但从隐约可辨的“在友邦日本指导之下”等内容可以推测,其目的应以教导岛民服从日军的领导、做日军统治下的顺民为主,即为对海南岛民实施文化渗透服务,侵略野心昭然若揭。

《海南迅报》社由日军直接指挥。后来,日本人又设立了《海南新闻》报。然而,由于这些报纸并不受岛民欢迎,发行量较小,因此两家报社始终未能做到收支平衡。为此,三省联络会议不得不予以补贴。对于报纸内容,日本占领军也采取了严格的审查制度。从具体分工看,“陆军军分别负责审查、监督与自身相关的军事内容”,而三省联络会议则“负责审查、监督一般性内容”。

除此之外,日军还曾发行过多张渲染日军与海南民众和谐相处的明信片,来美化侵略,粉饰太平。应日军要求,台湾共荣会还派遣电影技术员到海南岛巡回放映电影,宣抚岛民、慰劳日军。1941年4月1日,共荣会还在海口市设立了支部,经营影院。

为了管控大众传媒,防止不利于日本侵略的邮件流出或流入岛内,日军还专门发布文件,要求对所有进出岛邮件进行严格检查。当时日军官兵及日本公司的开发人员邮寄日本的照片和明信片的背面,都加盖有日军的检阅章。周

(参考文献略)



1939年出版的《画报跃进之日本》封面,杂志大篇幅刊登日本军队侵占海南时的图片。

海南日报记者 李英挺 翻拍